

《新安名族志》的编纂过程与版本

(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, 安徽合肥 230039) 朱万曙

摘要: 对于《新安名族志》的编纂过程, 日本多贺秋五郎和郑力民都曾经作过探讨, 但不少问题仍然模糊不清。经过对各版本和相关资料的分析, 本文认为, 该书的编纂过程为: 元代陈栋曾经有过一个未予“梓布”的《新安大族志》, 到明代中叶, 郑佐和洪垣将其刊刻; 叶本静、汪孟泣、戴廷明等人以 10 年的时间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采辑、编纂的工作, 完成了《新安名族志》, 于嘉靖二十九年刊刻; 程尚宽认为这个本子还不够完善, 又进行了“续补”, 增补了大量的内容。该书的版本, 据调查有 12 种, 分为 2 册、4 册和 8 册装三种, 4 册本和 8 册本是程尚宽“续补”后的刊本, 2 册本大多则是戴廷明等人编纂的本子, 但几种本子都有增删的情况。

关键词: 《新安名族志》; 版本; 编纂过程

中图分类号: G257.35 **献标识码:** A **章编号:** 1001-019(2004)05-116-7

《新安名族志》是研究徽州历史文化的一部重要的典籍资料。关于这部书的编纂过程和版本情况, 有两篇文章进行了讨论, ①一是日本多贺秋五郎的《关于〈新安名族志〉》, 收入《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》里; ②二是郑力民的《〈新安大族志〉考辨-兼谈〈实录新安世家〉》, 载于《安徽史学》1993 年第 3 期和 1994 年第 3 期。多贺秋五郎认为它的成书经历了三个阶段: 一是元代陈栋(定宇)作《新安大族志》; 二是嘉靖二十八年(1549 年)郑佐对其加以增补遗编, 称为《实录新安世家》; 三是嘉靖三十年程尚宽、戴廷明等人在郑作的基础上编集为《新安名族志》。郑力民则提出不同看法, 认为陈栋并未作《新安大族志》, 也不存在《实录新安世家》这本书, 这是多贺秋五郎望文生义的结果。

由于《新安名族志》对于徽学研究的重要性, 多贺氏和郑氏较早注意并讨论《新安名族志》的编纂过程和版本问题, 实在很有学术敏感; 由于《新安名族志》成书过程和版本的复杂性, 这一探讨又实在很重要。不过, 由于他们阅读条件有限, 对于有的问题, 仅仅是依据有限的资料信息进行推测。为了使更多的研究者能够利用这部重要徽学著作, 我们对它进行了整理, 因此调查了该书及《新安大族志》的版本情况, 在这里对该书的编纂过程和版本情况作一梳理和介绍, 并顺便对多贺氏和郑氏提出并讨论的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。

一、《新安大族志》是《新安名族志》编纂的基础

关于《新安大族志》, 多贺秋五郎介绍了日本“东洋文库”所藏的本子: 该本为 2 册木刻本, 其卷首有元代陈栋所撰写的序文, 但编者、年代皆未注明, 因此多贺氏首先怀疑“其编集者究竟是不是陈栋”; 同时, 多贺氏又指出: “这本书说是元代的本子是可信的, 因为, (一) 印刷(镌刻)、纸质、书体等方面, 可以断定为元代所为, 没有丝毫矛盾; (二) 各氏族的调查不充分, 有空白和余白; (三) 记载事项简洁, 接近于更古老些的氏族志的记载样式。”进一步, 多贺氏还进行了论述: “东洋文库的《新安大族志》推断编者为陈栋, 这是根据什么理由呢? (一) 书名完全相同; (二) 任何一次续修新安的名族志, 还没有记述过陈栋以外的大族志; (三) 陈栋的《新安大族志》之后的《实录新安世家》、《新安名族志》, 亦载有《新安大族志》的氏族名, 这尽可以全部于东洋文库所藏的《新安大族志》中见到。”

郑力民从著录情况和陈栋的生卒年人手, 作出了陈栋未作《新安大族志》的推断。他的理由是: (一) 迄今未见到国内有该书元刊本收藏的记录; (二) 去元不远的弘治《徽州府志》记载陈栋事迹较详, 却未提该书一字; (三) 元明间休宁人朱升为陈栋私淑弟子, 著述宏富, 也未提及此事; (四) 陈栋为元代大儒, 但遍查经典目录, 均无其作《新安大族志》的著录; (五)

署名陈栋所撰的《新安大族志序》不可能是陈栋所作，该序所署时间为“至元丁丑”，该年在元代的年份一是元世祖至元十四年（1277），二是元惠宗至元三年（1337），陈栋卒于元统二年（1334），故不会在元惠宗至元三年作此序；元世祖至元十四年陈栋26岁，从其个人品格、时代背景亦不可能作此序，且从徽州建制沿革看，书中多有不合之处。因此，郑力民的看法是，“陈撰元刊”是程尚宽等人“造成”的。他的结论是：元代陈栋未曾编撰过《新安大族志》，也未曾撰写过《新安大族志序》，因此该志并无元代刊本；《新安大族志》是由明代嘉靖时人戴廷明最终编定的。

我们认为，陈栋编撰《新安大族志》是可能的，至少在戴廷明等人编纂《新安名族志》之前肯定有一部《新安大族志》流传，它是《新安名族志》编纂的基础。但是，东洋文库所藏的本子并非元代刊本。

如郑力民所论，陈栋编集《新安大族志》固然未见于著录，但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做编集工作。从其生卒年推断，《新安大族志序》当然不可能作于元惠宗至元三年，但完全有可能作于元世祖至元十四年。关于与徽州府建制沿革的矛盾，其一，“一府六县”虽是从明代成为定制，但在此之前基本上就已形成该建制；其二，关于书中“宣明坊”地名，该书在明代刊刻和传抄，刊刻和传抄者依据当时的地名进行改动是正常的，程尚宽在《新安名族志引》里就说道：“元儒陈定宇尝编有《新安大族志》，其书惜未盛行者。双溪郑公、觉山洪公因其遗编增益而梓布之。”对地名有所改动也是“增益”的内容之一。最重要的是，该书并非刊刻于元代（详后说），则该书就是一个稿本，并且很简单粗陋，因此，它才不见于各种著录。^①

再从“陈撰元刊”提出的过程看。郑力民所列举的材料只有洪垣的序言和程尚宽的《引》。实际上，经程尚宽“续补”的《新安名族志》刊本，共有6篇序言，^②分别为郑佐、洪垣、胡晓、邵龄、王讽、程光显所作，另有程尚宽的《引》一篇。其中有4篇提及陈栋和《新安名族志》的关系：

1. 洪垣序称：“元儒陈定宇以不得行其志，惧乡俗日且疚决，乃窃取新安名族，叙其源委，以微存昭鉴之权于十一，识者亮之。”
2. 邵龄序称，“粤我古冈吴子，席珍黔麓……顷乃以是编者，为定宇陈子悬衡于胡元，已苛稼选；和溪诸子，缀毓于我代，犹歉遗珠。”
3. 石龙山人王讽序称：“而诸君子雅意斯举……则是岂不为陈定宇之遗意哉！”
4. 程尚宽《引》称：“元儒陈定宇尝编有《新安大族志》，其书惜未盛行者。”

可见，当时认为陈栋编集了《新安大族志》（或不叫此书名，但内容一样）的大有人在。

最后，从《新安大族志》刊本看。笔者得到了“东洋文库”所藏的《新安大族志》的复印件，其刊刻质量固然简陋，而其内容更为简单，只是后来的《新安名族志》的一个框架而已。^①若说它是《名族志》的节录本也不大可能，^②因为有了详细的《名族志》，就根本没有必要再刊出一个节录本。而且，其简单粗疏程度，远不可能是节录的结果。郑力民认为这是戴廷明等人最终编定的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因为该书并无关于戴廷明等人编纂的任何说明或序言，倒是现存的2册本的《新安名族志》郑佐的序言明确介绍了戴廷明等人的编纂情况；程尚宽的《引》说：“为之采录者，则始于祁之叶本静，继之以休之戴廷明辈，勤勤搜辑，垂十年矣！”难以理解他们用了10年的功夫完成的竟然是这样简单粗略的东西。因此，只能说，在戴廷明等人编纂《新安名族志》之前，就有一个简单粗略的《新安大族志》，而戴廷明等人正是以此为基础编纂《新安名族志》的。

多贺氏列举了不少理由，认为“东洋文库”所藏的《新安大族志》是元代刊本。国家图书馆和北师大图书馆均有著录为汪孟址、戴廷明撰的2册藏本《新安名族志》，其凡例称：“本志，元儒陈定宇栋著有《新安大族》，惜未梓行，间见抄本，疏略未备，且立例混于他郡姓名。今之采辑，惟著姓于吾新安有足微者悉书之，其无考及迁徙外郡者遗之。”^③这个凡例多贺

氏似乎没有看到。它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：陈栋的《新安大族志》，在戴廷明等人采辑增补的时候，并没有刊刻梓行。“东洋文库”所藏的《新安大族志》，其刊刻质量确实简陋，但要认定它是元刊本却很困难。程尚宽在《引》里也说，陈栋的《大族志》“其书惜未盛行，顷之，双溪郑公、觉山洪公因其遗编增益而梓布之。”如果将这两条材料结合起来分析，那么可以肯定，陈栋的《大族志》在当时是个抄本，而且在内容上有将“他郡姓名”混入其中的缺陷。因此，是由郑佐和洪垣对它进行了“增益”后刊行的。因此，东洋文库所藏的《新安大族志》并不是元代刊本，而应该是明代的刊本。

从现存的《新安大族志》的刊本和抄本看，它无疑是戴廷明和程尚宽等人完成和“续补”《新安名族志》的基础。

二、汪孟址、戴廷明等人的编纂及其版本特点

《中国善本书目》的编纂出版，为我们了解《新安名族志》的版本及其收藏情况提供了很大的方便。《中国善本书目·史部》著录了两种《新安名族志》的版本，一种题为“明汪孟址、戴廷明等撰”，收藏处有北京图书馆、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、安徽省图书馆；一种题为“明程尚宽撰”，收藏处有国家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、南京图书馆、浙江图书馆。另外，笔者在国家图书馆还见到台湾“中央图书馆”藏本的胶卷，总计有12种。^④不过，这样的著录可能并不确切，由于现存各种《名族志》的版本均没有在正文前面署上编纂者的姓名，著录者确定编纂者的依据只能是卷首的序言。根据我们的版本调查，有的本子完整，则可以据以确定编纂者，有的卷首和卷尾残缺，那么就难以确定编纂者。

由于现存《名族志》的大多数本子都有一篇乃至数篇序言，这些序言均为嘉靖三十年以前所作，因此，各种著录均称是嘉靖间刻本。这似乎是能够成立的。它们也全都分为上卷和下卷（前集和后集），但是装订的册数却不同，分别有2册、4册、8册3种。其中，4册本仅见于国家图书馆，8册本见于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，其余各处收藏均为2册本。

为了更清楚地了解《新安名族志》的编纂过程，有必要把程尚宽的《引》摘录如下：

新安，天下望郡也。《名族志》，所以别嫌明微，缘人情而以起义者也。元儒陈氏定宇尝编有《新安大族志》，其书惜未盛行者。双溪郑公、觉山洪公因其遗编增益而梓布之，彬彬乎可以观新安人文之盛矣，骚骚乎可以占世道亨昌之机矣。猜饮休载！而为之采录者，则始于祁之叶本静，继之以休之戴廷明辈，勤勤搜辑，垂十年矣！阅其名家尚多缺略，此盖情限于力之所弗及，而义睽于势所弗能故也。宽谨谋之六邑名公及诸同志者，仍其旧本而续补之，考其姓氏迁次而更定之，校其讹谬出没而厘正之，约其异而归之同，非故于其同而求之异，盖欲行吾义而情有不得不然者耳。若夫限于力而睽于势者，亦安如之何哉！隐！是知沧海信有遗珠矣！然而豪杰无自身游迹者乎？今之视古，犹后之视今也，补续之责，予于后之君子端有望焉。嘉靖辛亥夏五月吉旦乡晚生程尚宽谨书

这篇引言基本上说明了《新安名族志》的编纂过程：陈栋作《新安大族志》，但“惜未盛行”（实未刊刻），郑佐和洪垣对其进行“增益”并予以刊刻。继而叶本静和戴廷明等人又花十年的功夫进行编纂，但还不理想，于是他“仍其旧本而续补之”。但是多贺氏根据这篇引言和胡晓的序言，^①推断出戴廷明等人编纂的是一部《实录新安世家》，而不是《新安名族志》。对此，笔者赞同郑力民的看法：这是多贺氏“望文生义生造出来的”。

在《新安名族志》各版本中，国家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所藏8册本和台湾“中图”本都有上面所列举的6篇序言以及程尚宽的《引》。通过对各本序、跋情况的比较和分析，或许有可能帮助我们弄清楚该书的编纂过程。

上面已经介绍过，该书有6篇序言，另外还有朱莹、吴守教二人的跋。它们的撰写时间稍有差异，郑佐的序言撰于嘉靖二十八年（己酉），洪垣的序言和朱莹的跋撰于嘉靖二十九年，其余人的序言和程尚宽的《引》均撰于嘉靖三十年（辛亥）。国家图书馆所藏的2册本只有郑佐的序言，北京师范大学、安徽省图书馆所藏的2册本则只有郑佐和洪垣的序言。^②郑、洪二人的序言根本没有提及程尚宽的编纂工作。郑序称：“为此编者汪孟址、戴廷明、方德卿、程子瑛、王克和、吴信夫辈，独廷明

始终弗懈者。”洪序则称：“厥今和溪戴子、古山吴子、肠谷程子辈，则又因述旧典，更加撮集，以详著各族先世之善，核而不滥，侈而不夸，夫岂无所为哉！”

国家图书馆所藏的4册本情况则不然。其卷首恰恰没有郑佐和洪垣的序言，却多出吴守教的跋（残缺）和胡晓、邵龄、王讽、程光显的序言以及程尚宽的《引》。

1. 胡晓的序言称：“款库生中泉程子，因和溪戴子辈实录新安世家，编曰《新安名族志》。”

2. 邵龄的序言称：“粤我古冈吴子，席珍黔麓，……顷乃以是编者，为定宇陈子悬衡于胡元，已苛稼选；和溪诸子缀毓于我代，犹歉遗珠。则科斗或资于口授，服生宜享于康成，增遗附略，以告厥成功，信不容于但已也。”

3. 王讽序称：“嘉靖庚戌，正石龙子归自北都，适黔之库友古冈吴子携其《名族志》诣予而请序，且告予曰：其事创于六邑诸君子，曰汪子孟址，曰戴子廷明，曰胡子德卿，曰程子瘖，曰王子克和，曰叶子本静。盖皆贤士大夫之族也，而勤勤搜集十余年，而今始告完，而予也，则窃有补遗订缺之手于斯志者也。而幸六邑贤士大夫嘉其成而与之序矣，而惟祁独缺，是故兹来请石龙子阅其编，其缺略而未完者尚多也。”

4. 程光显序称：“然则古冈此编，岂惟补其缺略而已耶？亦以寄史外传心之志软！”

5. 吴守教跋称：“因程子之请，而复诸尾。”

当然，程尚宽本人的《引》更明确地宣告了自己的“续补”工作。

由以上序言可知，胡晓的序言开始说程尚宽编纂《新安名族志》，吴守教的跋也是应程尚宽之请而做的。邵龄、王讽序言都说到另外一个人——“古冈吴子”——做了“增遗附略”或“补遗订缺”的工作，不过他们也都提到了戴廷明等人前面的劳动，只有程光显的序言说“古冈此编”。

这样，我们可以明了的一个事实是：国家图书馆、北师大藏2册本是戴廷明等人编纂的《新安名族志》。此后，不仅程尚宽对该本进行了“续补”，而且“古冈吴子”也对该本进行了“增遗附略”或“补遗订缺”的工作。这位“古冈吴子”，应该不是郑佐序言里所提到的吴信夫。^①

这里还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，戴廷明等人编纂的《新安名族志》是否仅仅刊刻了一次？从我们的版本调查看，情况并非如此。

北京师范大学藏2册本比国图藏2册本除了多出洪垣的序言外，在文字上也有所增加。如休宁黄氏，就增补有“龙湾”、“黄川”、“五城溪口”、“商山”4条共计700余字。南京图书馆所藏的本子接近于国图2册本，但是也有差异。以休宁程氏为例：

国图本：汉口-会里-陪郭-闵口-富溪-溪头-五城溪口-中泽-荪田-语田-芳关-北村-金川-率东-临溪-泰塘-仙林

北师大本：汉口-率口-塘尾-溪西-屯溪-会里-陪郭-闵口-富溪-阳村-扁山-溪头-五城溪口-中泽-荪田-语田-芳关-北村-金川-率东-临溪-泰塘-隐冲岭上-珠光-底山-东关口-仙林-临溪街-胡村

南图本：汉口-塘尾-溪西-屯溪-会里-山斗-陪郭-闵口-富溪-阳村-两山-五城-溪头-五城溪口-中泽-荪田-语田-芳关-北村-金川-率东-临溪-泰塘（后残缺一页）

这个情况说明，戴廷明等人的本子于嘉靖二十八年刊刻后，在二十九年又有刊补，甚或在二十九年后还有刊补。就笔者已经阅读过的《新安名族志》各版本而言，各本均有或大或小的差异，除了程尚宽的“续补”外，可能由于应各宗族的要求不断重印，并不断地修改、补充，造成了这种情况。

三、程尚宽的“续补”本及其版本特点

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四册本显然是程尚宽增补的本子。因为该本不仅卷首没有郑佐和洪垣的序言，却多出吴守教的跋（残缺）和胡晓、邵龄、王讽、程光显的序言以及程尚宽的《引》，而且比2册本文字也多出不少：

1. 姓氏的增加：增加了邓、殷、徐、万、严五姓；

2. 各姓氏在各地的增加，如胡氏：

2册本：款·方塘-佳源-槐源·琶塘·胡村（有目无文）

4册本：款·方塘-佳源-槐源·琶塘·胡村（有目无文）-东关

2册本：休宁·霞阜-刻溪（有目无文）

4册本：休宁·刻川-霞阜-炎叨溪（有目无文）

2册本：婺源·清华-考水-王川-城东-椿庄-南门

4册本：婺源·清华-考水-王川-城东-东溪-登稼坊

2册本：祁门·贵溪-城东-南门-椿庄-溶口·平里·山亭（有目无文）

4册本：祁门·贵溪-城东-南门-椿庄-溶口·平里·山亭（有目无文）

2册本：黔县·横冈-牌楼里

4册本：黔县·横冈-牌楼里-潭口-忠信坊-西递-南山

2册本：绩溪·市东-遵义坊-东门-龙川（有目无文）-胡里镇-西街

4册本：绩溪·市东-遵义坊-东门-龙川坑口-胡里镇-西街

增补的部分有款县东关（约480字）、黔县的潭口、忠信坊、西递、南山（约1200字）；绩溪的龙川胡氏在2册本里有目无文，4册本则以约1600字的篇幅详细介绍。由此可见，4册本较之2册本的确增补了不少的内容。这说明程尚宽并非简单地将戴廷明等人的编纂转换成自己的编纂，而是的确做了“续补”的劳动。

那么，程尚宽为什么又要再行“续补”呢？是否仅仅是出于“阴暗”的心理将汪、戴的劳动据为己有呢？实际上，程尚宽并没有这样做。他在《引》里交代得很明白：在郑佐、洪垣梓布陈栋的《大族志》后，“为之采录者，则始于祁之叶本静，继之以休之戴廷明辈，勤勤搜辑，垂十年矣！”这里，他已经充分肯定了叶、戴等人的劳动。但是，他也指出，汪、戴之作存在着“阅其名家尚多缺略”的问题，其原因在于“情限于力之所弗及，而义睽于势之所弗能”。因此，他“谨谋之六邑名公及诸同志者，仍其旧本而续补之，考其姓氏迁次而更定之，校其讹谬出没者而厘正之，约其正而归之同”。显然，他所说的“旧本”不是陈栋的《大族志》，而是汪、戴完成的本子。

现在，我们要讨论一下8册本的情况。

笔者所寓目的8册本有两种：一是国家图书馆藏本，二是上海图书馆藏本。与4册本相比，8册本增加的文字更多，约有其三分之一。（一）增加的姓氏有减、萧、桂、阮、顾五个，并改4册本邓姓为巴姓、高姓为梅姓。（二）大量增加了地方条目，如程姓，在歙县·槐塘后增加了虹梁、潜口、元里村、宣明坊、表里、冯塘、褒嘉坦、严镇、竭田、唐贝、方村等11条。又如黄姓，在歙县黄屯之后增加了虬村、瑞野黄村、税者黄村、官塘黄村、新馆黄村五条达5000多字的内容。

正如上面所说的，可能由于应各宗族的要求不断重印，并不断地修改、补充，现存的两个8册本《新安名族志》虽然内容大体相同，也还存在少量的差异。

至此，我们可以对《新安名族志》的编纂过程作如下的认识：元代陈栋曾经有过一个未予“梓布”的《新安大族志》，郑佐和洪垣将其刊刻；叶本静、汪孟址、戴廷明等人以10年的时间进行了采辑、编纂的工作，完成了《新安名族志》，于嘉靖二十九年刊刻；程尚宽认为这个本子还不够完善，又进行了“续补”，增补了大量的内容。

最后，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：现存的《新安名族志》，无论是几册装的本子，它们之间都有文字差异，有的本子挖补的情况比较明显，这是该书有别于其他典籍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。这说明，在戴廷明等人编纂出该书之后，受到了徽州各宗族的重视，因此，在刊印过程中就不断地增补，或者对有些不利于本族的文字进行删改，从而导致了各版本之间的或大或小的差异。

The Compiling Process and Various Editions of *The Prominent Lineages in Xin'an (Xin'an Minzu Zhi)*

ZHU Wan-shu

Abstract: The compiling process of *The Prominent Lineages in Xin'an (Xin'an Minzu Zhi)* is still unclear even though the Japanese scholar Taga Akigoro and Zheng Limin have conducted some investigation of the issue. After analyzing various editions of the prefecture-wide genealogy and other related sources,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re existed an unprinted version of [Yuan dynasty] Chen Li's *Xin'an Dazu Zhi*, which Zheng Zuo and Hong Yuan published in the Mid-Ming. Based on this edition, Ye Benjing, Wang Mengzhi and Dai Tingming, after ten years of additional collecting and compiling, produced the *Xin'an Minzu Zhi*, which was printed in 1550. Cheng Shangkuan, still unsatisfied with the 1550 edition, added a large amount of new information and finally completed *Prominent Lineages in Xin'an*.

Key words: *Xin'an Minzu Zhi (The Prominent Lineages in Xin'an)*; various editions; compiling

责任编辑：张朝胜；校对：陈如